

论长孙无忌与初唐政治

王 怡

(四川师范大学 文理学院, 成都 610068)

摘 要: 长孙无忌历仕唐高祖、太宗、高宗三朝,位尊权重。其在初唐政坛上之大作为,一是佐太宗夺嫡,一是定高宗储君地位,皆挟私心以为帝王个人效力,自始至终皆非唐朝社稷之臣。其在太宗朝,慑于太宗之英武,加以长孙皇后之约束,以善避嫌疑获得保全并为太宗所倚重。其在高宗朝,则因误认高宗柔懦,专擅政柄,终于招致杀身之祸。

关键词: 太宗朝政治;高宗初年政治;长孙无忌之死

中图分类号: K 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14)04-0144-07

长孙无忌历仕唐高祖、太宗、高宗三朝,是初唐政坛上位尊权重的风云人物,居凌烟阁 24 功臣之首。然而迄今为止,人们仅在研究武则天时涉及他。至于无忌一生事业及其与初唐政治的关系,则未见有全面探讨之者。这应该是初唐历史研究中的一个不足。因撰拙稿,以就教于世之治唐史者。

一、长孙无忌与太宗朝政治

无忌是长孙皇后之兄,少与太宗友善。高祖朝,他仕至比部郎中,封上党县公。在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中,无忌自始就站在李世民一边。是他和高士廉、侯君集、尉迟敬德等促成李世民下决心发动政变,是他奉李世民的命密召房玄龄、杜如晦等策划政变事宜,是他在政变当日与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瑾、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等 9 人,在李世民率领下伏兵于玄武门,杀死太子和齐王。玄武门政变第一等功臣 5 人,无忌居首。

据《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载: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为太子,无忌授太子左庶子。八月,李世民即帝位,无忌授左武侯大将

军。贞观元年,无忌任吏部尚书,进封齐国公。其年七月,拜尚书右仆射。《旧唐书·长孙无忌传》称:“太宗以无忌佐命元勋,地兼外戚,礼遇尤重,常令出入卧内。”^①无忌以功臣兼外戚的特殊身份,又深蒙太宗倚任,本来是可以在太宗朝政坛上大有作为的。

然细阅载籍,在造成贞观之治上,无忌实未起重要作用。考其原因,主要是长孙皇后劝谏太宗并约束无忌。《旧唐书·后妃传上·长孙皇后传》载:“时后兄无忌夙与太宗为布衣之交,又以佐命元勋,委以腹心,出入卧内,将任以朝政。后固言不可,每乘间奏曰:‘妾既托身紫宫,尊贵已极,实不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汉之吕、霍,可为切骨之戒,特愿圣朝勿以妾兄为宰执。’太宗不听,竟用无忌为左武侯大将军,吏部尚书、右仆射。后又密遣无忌苦求逊职,太宗不获已而许焉。”^②贞观元年正月,无忌罢右仆射,改授开府仪同三司。此次无忌任相,不过半年。

长孙皇后不欲无忌执政,是汲取历史教训,计虑深远。《旧唐书·长孙皇后传》载:“又著论驳汉明德马皇后,以为不能抑退外戚,令其当朝贵盛,乃戒其龙马水车,此乃开其祸源而防其末事

收稿日期:2013-11-15

作者简介:王怡,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师范大学文理学院讲师。

① 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2447 页。

② 刘昫等:《旧唐书》,第 2165 页。

③ 刘昫等:《旧唐书》,第 2167 页。

耳。”^③贞观十年,长孙皇后临终前请求太宗:“妾之本宗,幸缘姻戚,既非德举,易履危机,其保全长久,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则为幸矣!”正是从维护国家大局并保全后族身家出发,长孙皇后说服了太宗。贞观二年正月,无忌罢右仆射。

《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载:“或有密表称无忌权宠过盛,太宗以表示无忌曰:‘朕与卿君臣之间,凡事无疑。若各怀所闻而不言,则君臣之意无以获通。’”^①应该说,太宗此言发自肺腑,他是真心倚重无忌。但此事依然震撼了无忌,也证明长孙皇后的担心有理。《旧无忌传》称:“无忌深以盈满为戒,忌辞机密。”^②

《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载:贞观十一年,太宗诏令无忌等功臣世袭刺史,无忌与房玄龄上表恳辞。表文陈述4条理由,其中第三条是:“且孩童嗣职,义乖师俭之方;任以褰帷,宁无伤锦之弊。上干天宠,彝典既有常科;下扰生民,必致余殃于后。一挂刑网,自取诛夷。陛下深仁,务延其世,翻令剿绝,诚有可哀!”表文最后请求:“伏愿天泽,谅其愚款,特停涣汗之旨,赐其性命之恩!”^③在秦朝实行郡县制以后,分封世袭是倒退行为。无忌等坚辞,固然是因为此举违逆时势,不该接受;但也是因为虑及身家安全,不敢接受,此所以有“赐其性命之恩”之说也。

贞观十九年三月,无忌摄侍中,再次拜相。贞观二十二年正月,无忌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三省事。无忌此时权位,为太宗朝任何宰臣所不及。无忌由贞观前期“忌辞机密”,到贞观末年成为政事堂中第一人,这个变化,主因是贞观十七年废立太子事。

长孙皇后生三子:长子李承乾为太子,第四子李泰封魏王,第九子李治封晋王。李泰才学最优,得太宗宠爱,遂萌夺嫡之思。承乾感到威胁,图谋不轨。贞观十七年四月,承乾谋反事败露,被废为庶人。《资治通鉴》卷197贞观十七年载:

太子承乾既获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许立为太子,岑文本、刘洎亦劝之;长孙无忌固请立晋王治。上谓侍臣曰:“昨青雀(李泰小字)投我怀云:‘臣今日始得为陛下子,乃更生之日也。臣有一子,臣死之日,当为陛下杀之,传位晋王。’人谁不爱其子,朕见其如此,甚怜之。”谏议大夫褚遂良曰:“陛下言大失。愿审思,勿误也!安有陛下万岁后,魏王据天下,肯杀其爱子,传位晋王者乎!陛下日者既立承乾为太子,复宠魏王,礼秩过于承乾,以成今日之祸。前事不远,足以以为鉴。陛下今立魏王,愿先措置晋王,始得安全耳。”^④

按:遂良之议,可谓洞见魏王诈伪隐情,太宗当即作出决断。同书同卷又载:

承乾既废,上御两仪殿,群臣俱出,独留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谓曰:“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无忌等请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上谓治曰:“汝舅许汝矣,宜拜谢。”治因拜之。……丙戌,诏立晋王治为皇太子,……上谓侍臣曰:“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且泰立,承乾与治皆不全;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⑤

司马光于此论曰:

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爱,以杜祸乱之原,可谓能远谋矣!^⑥

太宗的本意是立李泰,改立李治是无忌、遂良争取的结果。无忌、遂良能够如愿,表面原因是李泰欲益反损,弄巧成拙。深层原因是遂良之议触到了太宗心病,当年玄武门流血政变的阴影陡地又上心头。他害怕后世子孙重演自相残杀的惨剧,害怕政局动荡危及社稷。他的确是为“杜祸乱之原”而有此“远谋”。《旧唐书·太宗诸子传·濮王泰传》载:

① 刘昫等:《旧唐书》,第2447页。

② 刘昫等:《旧唐书》,第2447页。

③ 刘昫等:《旧唐书》,第2452页。

④ 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195页。

⑤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6196—6197页。

⑥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6196—6197页。

寻改封泰为顺阳王,徙居均州之鄖乡县。太宗后尝持泰所上表谓近臣曰:“泰文辞美丽,岂非才士。我中心念泰,卿等所知。但社稷之计,断割恩宠,责其居外者,亦是两相全也。”^①

太宗废泰之不得已,情见乎辞。但在太宗是出于“社稷之计”,在无忌却是出于私计。李泰与李治虽皆无忌亲侄,但李泰本为太宗属意,早有才名,身边又有一班党羽。立泰,则无忌不能居功,亦不能在新君之朝操持政柄。立治,则不仅有大功,而且能居辅弼之任。太宗谓治“汝舅许汝,宜拜谢”一语,就表明了无忌因为立治一事而在朝中取得特殊地位。在太宗晚年为太子组建的辅臣班子中,无忌居于首位。贞观二十二年,无忌总三省之事,成为唐世相臣中总揽三省大政之惟一一人。当年长孙皇后密嘱无忌忌辞机密,无忌本人亦远避权要的情况,因立李治为太子而发生根本改变。

据《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载,太宗晚年,曾当面评论无忌:

善避嫌疑,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而总兵攻战,非所长也。^②

在太宗看来,“善避嫌疑”是无忌的最大优点。盖无忌以皇后亲兄而为佐命元勋,两种身份皆易致嫌疑。无忌在贞观之世,长时期兢兢然以盈满为惧,不处权要,既有益于政局之稳定,又有益于自我保全。无忌虽然因此在贞观之治中缺乏建树,但太宗毅然将太子托付无忌,除却亲舅关系,主要就是看中无忌“善避嫌疑”。太宗显然认为,“善避嫌疑”的无忌,会在将来忠心翼戴新君。《资治通鉴》卷199贞观二十三年载:

(太宗临终)谓太子曰:“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③

其时,无忌、遂良在场。故太宗此语,是对太子说,

也是对无忌说。他显然希望并且相信,太子会倚任无忌,而无忌会恪尽辅佐之忱,竭尽股肱之力。

二、长孙无忌与高宗初年政治

《资治通鉴》卷199永徽元年载:

无忌与褚遂良同心辅政,上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④

史臣以“有贞观之遗风”赞美永徽之政,并赞美高宗“恭己以听”辅臣。

但高宗其实并不甘心“恭己以听”。同书同卷载: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太宗死。六月,高宗立。十月,高宗“问大理卿唐临系囚之数”,并亲录系囚。^⑤永徽元年正月,高宗召见朝集使,谓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从此,每日“引刺史十人入阁,问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⑥。永徽元年十月己未,监察御史韦思谦劾奏辅臣之一中书令褚遂良“抑买中书译语人地”,“是日,左迁遂良为同州刺史”^⑦。以上事实,说明高宗力图有所作为。至于左迁与无忌“同心辅政”的褚遂良,更出自高宗乾断。此举明白无误地表示了高宗对辅臣的不满。

又,同书同卷永徽二年九月载:

上谓宰相曰:“闻所在官司,行事犹互观颜面,多不尽公。”长孙无忌对曰:“此岂敢言无。然肆情曲法,实亦不敢。至于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不能免。”^⑧

高宗不满政府机构“互观颜面,多不尽公”,实际上是对主持政府工作的无忌提出了批评。无忌却曲加回护,并说“恐陛下尚不能免”,顶撞高宗。这是继左迁遂良之后,又一次在高宗与辅臣之间发生的冲突。在太宗朝“善避嫌疑”的无忌,为什

① 刘昫等:《旧唐书》,第2656页。

② 刘昫等:《旧唐书》,第2457页。

③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6267页。

④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6270—6271页。

⑤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6269页。

⑥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6270页。

⑦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6273页。

⑧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6275—6276页。

么在高宗朝竟如此不避嫌疑呢?

《通鉴》史臣在记述此事之后写道:“无忌以元舅辅政,凡有所言,上无不嘉纳。”^①这是从高宗方面说,但“嘉纳”二字不确。无忌于高宗是元舅,又有拥立大功,故高宗虽有不满,亦加含容。

若从无忌方面推究其原因,除了他是高宗元舅并有拥戴之功以外,更重要的,是他为自己在太宗朝和在高宗朝的角色定位不同。据《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载,太宗尝谓无忌等曰:“朕闻主贤则臣直,人苦不自知,公宜面论,攻朕得失。”无忌奏言:“陛下武功文德,跨绝古今,发号施令,事皆利物。《孝经》云:‘将顺其美。’臣顺之不暇,实不见陛下有所愆失。”^②其时已是太宗晚年,“愆失”甚多。当太宗求谏之时,无忌却进颂词。这固是无忌阿谀太宗,同时亦可见出无忌为自己在太宗朝的角色定位是“将顺其美”,并且自以为“顺之不暇”。细检载籍,太宗一朝23年间,无忌始终未曾一进谏言以裨补时政。《资治通鉴》卷198贞观十九年载:唐太宗伐高丽,召诸将问计,无忌对曰:“陛下未冠,身亲行阵,凡出奇制胜,皆上禀圣谋,诸将奉成算而已。今日之事,乞陛下指踪!”^③此种表现,正是无忌在太宗朝的典型作风。可是在高宗朝,他变了,不但如《旧唐书·长孙无忌传》所载“数进谋议”,而且敢与高宗立异。显然,无忌为自己在高宗朝的角色定位不是一般的辅臣,而是高宗的监护人,朝政的主持人。

这样的角色定位,与太宗有关。《资治通鉴》卷197贞观十八年载:

上谓群臣曰:“太子性行,外人亦闻之乎?”司徒无忌曰:“太子虽不出宫门,天下无不敬仰圣德。”上曰:“吾如治年时,颇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宽厚,谚曰:‘生子如狼,犹恐如羊。’冀其稍壮,自不同耳。”无忌对曰:“陛下神武,乃拔乱之才;太子仁恕,实守文之德,趣尚虽异,各当其分,此乃皇天所以祚大唐而福苍生者也。”^④

又,同书卷199贞观二十三年载:

(太宗疾笃)召无忌及褚遂良入卧内,谓之曰:“朕今悉以后事付公辈。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⑤

太宗与无忌均以为高宗仁弱,故均仅希望高宗即位后能够守成。对于无忌是“悉以后事”相付,他嘱咐无忌“辅导”而不仅是辅佐高宗。如前所述,太宗还宽慰高宗:有无忌在,“汝勿忧天下”。故以无忌主持高宗朝的政务,乃是太宗的安排。

不过,太宗与无忌对高宗的看法虽同,心情却异。太宗于高宗是“冀其稍壮,自不同耳”,即希望高宗终于能够成为一代英主。无忌则十分满意高宗的现状。太宗表现出来的是对于高宗的父爱和对于唐朝命运的关心。无忌表现出来的是对于自己在高宗朝将会大权在握的憧憬。这里显示了无忌力主立高宗为储君的私心。就此私心而言,无忌并非公忠谋国之臣。

无忌“辅导”高宗的结果,是“永徽之政有贞观之遗风”。这符合太宗和无忌对于高宗守成的期待。

《资治通鉴》卷198贞观二十二年载:太宗作《帝范》十二篇以赐太子,嘱咐太子“更求古之哲王以为师”,并自我评价:“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美尽善,固多愧矣!”^⑥应该说,太宗在晚年是清醒的,评价也是谨慎而客观的。不过,据此也可看出,太宗对于自己一生功业,对于国家情况,基本上是满意的。这是他愿意高宗守成的又一个原因。

至于无忌,他本来就以为太宗功业“跨绝古今”,故以守成为自己“辅导”高宗的使命。

这就牵涉到如何正确认识“贞观之治”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唐史研究已经确认:

①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6276页。

② 刘昫等:《旧唐书》,第2453页。

③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6225页。

④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6208页。

⑤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6267页。

⑥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6251页。

太宗一朝政情,贞观五年以后即逐渐倒退,太宗晚年失误尤多。而由于隋炀帝暴政及隋末唐初长时期战乱,社会极度荒残,虽经太宗君臣励精图治,国家亦未富庶繁荣。诚如魏征所言:“陛下功则高矣,而民未怀惠;德虽厚矣,而泽未滂流;诸夏虽安,未足以供事;远夷慕义,无以供其求;符瑞虽臻,闾罗犹密;积岁丰稔,仓廩尚虚。”^①故贞观之世是治世不是盛世,太宗失误需要改正,太宗事业需要发展。太宗愿意高宗守成,是他以为高宗非大有为之君,不得已而提出的最低要求。无忌满足于守成,是无忌识见不高。古代史家以有贞观遗风肯定永徽之政并肯定无忌辅政,则是由于对贞观之治缺乏分析。

故无忌主持下的永徽之政,成绩平平。至于无忌利用房遗爱谋反案诬害吴王李恪及江夏王李道宗,则是他主政期间的一大错误。据《旧唐书·太宗诸子传·吴王恪传》载:太宗第三子李恪,其母杨妃,隋炀帝女。恪先封蜀王,后改封吴王。恪“有文武才,太宗常称其类己。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长孙无忌既辅立高宗,深所忌嫉。永徽中,会房遗爱谋反,遂因事诛恪,以绝众望。海内冤之。”^②又,同书《宗室传·江夏王道宗传》载:永徽四年,“房遗爱伏诛。长孙无忌、褚遂良素与道宗不协,上言道宗与遗爱交结,配流象州,道病卒。”《旧唐书》史臣于《太宗诸子传》后论曰:“太宗诸子,吴王恪、濮王泰最贤,皆以才高辩悟,为长孙无忌忌嫉,离间父子,遽为豺狼。而无忌破家,非阴祸之报欤!”^③又于《宗室传》后论曰:“道宗军谋武勇,好学下贤,于群从之中,称一时之杰。无忌、遂良衔不协之素,致千载之冤。永徽中,无忌、遂良忠而获罪,人皆哀之。殊不知诬陷刘洎、吴王恪于前,枉害道宗于后,天网不漏,不得其死也宜哉!”^④按:无忌获罪不在“永徽中”,而在显庆四年。《旧唐书》史臣虽然同情无忌“忠而获

罪”,却因无忌陷害吴王恪、江夏王道宗,而以为无忌“不得其死”,乃“阴祸之报”!《资治通鉴》卷199永徽四年记载吴王恪临死骂曰:“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⑤

《旧唐书》史臣之论,揭出无忌“忌嫉”之隐衷。吴王恪责无忌“窃弄威权”,点到了事情的要害。高宗当亦由此窥见无忌擅权之野心。后来许敬宗诬无忌谋反,而高宗不疑,应与此事有关。

总之,无忌在永徽间之作为,虽与太宗安排有关,却与太宗用心有别。他是利用自己功臣兼元舅的特殊身份,拥立高宗的特殊功绩,太宗的临终顾托,以辅政之地位,行专权之实。这自然要与高宗发生矛盾。其志仅在守成,亦与历史进步需要相违。《资治通鉴》卷199永徽五年七月载:

上谓五品以上曰:“顷在先帝左右,见五品以上论事,或仗下面陈,或退上封事,终日不绝。岂今日独无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⑥

高宗这样批评朝臣,说明高宗对于无忌主持下的政府工作很不满意,对于无忌控制下的朝堂上的不正常现象感到愤怒。毋庸置疑,永徽政治呈现出来的万马齐喑局面,高宗是不能继续容忍下去了。

三、长孙无忌之死

史载无忌之死由于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资治通鉴》卷199永徽五年载:

上由是有废立(皇后)之志,又畏大臣不从,乃与(武)昭仪幸太尉长孙无忌第,酣饮极欢,席上拜无忌宠姬子三人皆为朝散大夫,仍载金宝缙锦十车以赐无忌。上因从容言皇后无子以讽无忌,无忌对以他语,竟不顺旨,上及昭仪皆不悦而罢。昭仪又令母杨氏诣无忌第,屡有所请,无忌终不许。礼部尚书

① 刘昫等:《旧唐书》,第2560页。

② 刘昫等:《旧唐书》,第2650页。

③ 刘昫等:《旧唐书》,第2666页。

④ 刘昫等:《旧唐书》,第2357页。

⑤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6286页。

⑥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6286页。

许敬宗亦数劝无忌,无忌厉色折之。①

胡注于此论曰:

上于无忌官及庶孽又有横赐,意可知矣。无忌欲革其非心,则辞而不可受也。为无忌得罪张本。②

观高宗、昭仪以恩宠无忌的方式争取无忌支持,则无忌当时的地位足以左右朝局可知。胡注批评无忌不当接受高宗“横赐”,是从为臣之道立论,盖无忌行事有悖于为臣之正道。此可见出高宗此举之不得已。无忌当高宗面竟“对以他语”,接受“横赐”又“竟不顺旨”,在无忌是显得倨傲,在高宗则必定难堪。高宗当由此痛感君权之不能伸张。高宗对于自己即位以来所处的“恭己以听”地位的不满当亦由此而达到极点。故在高宗一面,无忌在废立皇后事上持异议所引起的不满较轻,而无忌轻视君上所引起的不满较重。故无忌之死,第一个原因同时也是深层的原因,是由于专擅朝政所引起的他同高宗之间的矛盾,第二个原因同时也是表层的原因,才是他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

《资治通鉴》卷200显庆四年四月载:

武后以太尉赵公长孙无忌受重赐而不助己,深怨之。……武后既立,无忌内不自安。后令敬宗伺其隙而陷之。③

故许敬宗诬害无忌系受武后指使,此所以历来皆以为无忌死于武后报怨也。然其时武则天立为皇后仅三年余,羽翼远未丰满,如无高宗决断,势不能推倒无忌。《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载:

(显庆)四年,中书令许敬宗遣人上封事。称监察御史李巢与无忌交通谋反,帝令敬宗与侍中辛茂将鞠之。敬宗奏言无忌谋反有端,帝曰:“我家不幸,亲戚中颇有恶事。……今阿舅复作恶心。近亲如此,使我惭见万姓。”敬宗曰:“房遗爱乳臭儿,与女子谋反,岂得成事?且无忌与先朝谋取天下,众人服其智,作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可谓威能服物,智能动众。臣恐无忌知事露,即为急计,攘袂一呼,啸

命同恶,必为宗庙深忧。诚愿陛下断之,不日即收捕,准法破案。”……帝竟不亲问无忌谋反所由,惟听敬宗诬构之说,遂去其官爵,流黔州,……敬宗寻与吏部尚书李义府遣大理正袁公瑜就黔州重鞠无忌反状,公瑜逼令自缢而死,籍没其家。④

按:观高宗“今阿舅复作恶心”一语,他是真心相信了敬宗的诬辞。这应是高宗自即位以来长时期里积累起来的对于无忌专权感到不满并感到不安的结果。故由无忌专权引发的君臣之间的矛盾,以及高宗由不安到不信任无忌,才是无忌死于冤案的主要原因。故制造无忌冤案者虽为武后,而无忌冤案能够成立,则由于高宗视无忌为行使君权之障碍。

无忌是关陇集团的首领,他的贬死,宣告了关陇集团控制中央政权局面的终结。由此开始的中古社会历史变革,为治唐史者所公认。但因此一来,无忌冤案的负面意义被忽略了。武则天玩弄政治阴谋制造冤案排斥异己,即始于诬陷无忌及其集团中人。其后武则天任用酷吏大兴冤狱,乃是故伎重演。这是应当重视的武则天的一大恶政。故不能因为无忌守旧而则天革新,就肯定武则天一手制造的无忌冤案。盖在政治斗争中不择手段,乃是一部政治历史充满血腥和污秽的重要原因。故明辨此种是非,为澄清历史所必要,亦为澄清政治所必要。

余 论

《资治通鉴》卷197贞观十七年十一月载:

上疑太子仁弱,密谓长孙无忌曰:“公劝我立雉奴(李治小字),雉奴弱,恐不能守社稷,奈何!吴王恪英果类我,我欲立之,何如?”无忌固争,以为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己之甥邪?”无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储副至重,岂可数易?愿陛下熟思之。”上乃止。⑤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1《高宗一》论曰:

①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6287页。

②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6287页。

③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6312页。

④ 刘昫等:《旧唐书》,第2455—2456页。

⑤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6206页。

承乾废,魏王绌,太宗既知恪之可以守国也,则如光武之立明帝,自决于衷,而不当与无忌谋。如以高宗为嫡子而分不可紊,则抑自决于衷,而尤不当与无忌谋。疑而未决,则在廷自有可参大议之臣,……资其识以成其断。唯无忌者,高宗之元舅也,而可与辨高宗与恪之废立乎?……事既不果,无忌所早作夜思以疑恪、忌恪、畏恪之怨己而欲勤绝其命者,终不忘矣。①

按:船山以为太宗无论立治还是立恪,皆不当与无忌谋,甚是。太宗在建储事上谋及无忌的结果,既造成无忌在高宗朝之专权地位,又导致无忌蓄意谋害李恪。太宗之所以有此失误,乃是因为高度信任无忌,即所谓“朕与卿君臣之间凡事无疑”也。

《资治通鉴》卷 197 贞观十七年十二月载:

上谓吴王恪曰:“父子虽至亲,及其有罪,则天下之法不可私也。汉已立昭帝,燕王旦不服,阴谋不轨,霍光折简诛之。为人臣子,不可不戒!”②

这是太宗在接受无忌之议,下决心维护李治的太子地位以后,告诫李恪谨守“为人臣子”的立场。其意在保全李恪。然而太宗却没有嘱咐无忌善待诸王。在太宗,是不知无忌根本就不是霍光;在无忌,则是深深辜负了太宗的信任。无忌早年以太宗妻兄的特殊地位,助太宗夺嫡。后来又以私心拥立李治,谋害李恪。其一生事业,于大唐建国及治国均不见有何成绩,乃佐世民夺嫡之元勋也。其在政治上之大作为,一在佐太宗以成就帝业,一在定高宗之储君地位,皆挟私心以为帝王个人效力,因而取得高位重权,自始至终皆非唐朝社稷之臣。其在太宗朝,慑于太宗之英武,加以长孙皇后之约束,以不处机务获得保全,以善避嫌疑为太宗所倚重。其在高宗朝,则因误认高宗为柔懦,专擅政柄,招致大祸。其人以阴计获得成功,则其终为武后阴计所害,岂非所谓“君以此始,亦以此终”欤!

On Zhangsun Wuji and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Early—Tang Dynasty

Wang Yi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8, China)

Abstract: Zhangsun Wuji (长孙无忌) acted as an official in high position with great power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Gaozu (Li Yuan, 李渊), Emperor Taizong (Li Shimin, 李世民) and Emperor Gaozong (Li Zhi, 李治) of the Early-Tang Dynasty. His great deeds on the political arena in the Early-Tang Dynasty included his assistance to Li Shimin in becoming the crown prince, and his setting the position of Li Zhi as the crown prince. But as he served the three emperors out of selfishness, he never became the pillar of the state in the Early-Tang Dynasty. When Emperor Taizong was in reign, Zhangsun Wuji was frightened by the martial bearing of Emperor Taizong and was restrained by Empress Zhangsun (长孙皇后), the official wife of Emperor Taizong. As he was good at avoiding suspicion and protecting himself, he was favoured by Emperor Taizong. But when Emperor Gaozong was in reign, he mistakenly considered that Emperor Gaozong was feeble and weak. As he usurped authority, he finally invited the disaster that costed him his life.

Key words: political situation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Tai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唐太宗), political situation during the early reign of Emperor Gao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唐高宗), death of Zhangsun Wuji (长孙无忌)

(责任编辑 郑园)

① 王夫之:《读通鉴论》,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717—718 页。

②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 6206 页。